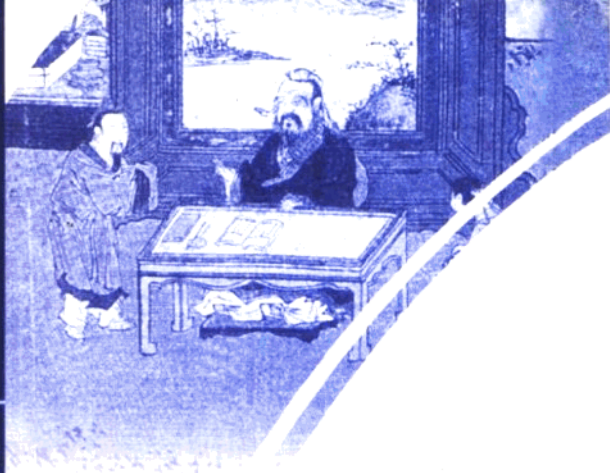


臧宏
朱仁夫
何钦法
编著



东方

圣经的故事

DONGFANGSHENGJINGDEGUSHI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东方圣经的故事

DONGFANGSHENGJINGDEGUSHI

臧宏 朱仁夫 何欣法 编著



献给孔子诞辰2550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圣经的故事/臧宏, 朱仁夫, 何钦法编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3

ISBN 7-5336-2339-8

I. 东… II. ①臧… ②朱… ③何… III. 论语—故事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630 号

责任编辑:彭克明

装帧设计:杨 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5

字 数:350 000

版 次: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1.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651321

邮编:230061

序

这是一部故事化的孔子世家和孔子人生哲理的书。

孔子、耶稣都是人类史上的“圣人”。耶稣以传奇故事在西方世界名世，孔子以真实人生在东方垂教。“圣人”的传奇故事能成为“圣经”，“圣人”的真实人生更当是儒教人生“圣经”，故本书名曰：《东方圣经的故事》。

我们所说的“东方圣经”，不只是指孔子的《论语》，而是指他一生的做人、做事的修养，即做学问的全过程。有人把做学问同做人、做事对立起来，认为做学问就是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有学问。这是不对的，孔子就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书本知识不等于学问，书本知识渊博，不一定就是学问好。学问有它的枝叶，更有它的根本。书本可以用来表达学问，但这只是学问的枝叶、学问的花朵，不能算是学问的根本。学问的根本，是做人、做事的修养或做人、做事的道理。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

语·学而》》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同上）这是告诉我们，学问的根本是做人、做事，是关于“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等方面的修养；而“学文”，即学习各种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有剩余的精力，就学，无剩余的精力，不学也可以。孔子以自身为例，说如果谈书本知识，也许他和一般的知识分子差不多。至于讲他自己身体力行做到了君子这个标准没有，那么他自己反省，实在还没有很大的心得。这是说，学习书本知识易，而学会做人、做事难。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得更明白。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同上）在子夏看来，一个人只要在做人、做事方面有好的修养，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也会说他真有学问。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有若，更明确地指出，学问不是别的，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同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在这个根本上去努力修养的人，就是有学问的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道”就是学问。把学问看成是做人、做事的修养或道理，这是孔子人生观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我们撰写《东方圣经的故事》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或根本原则。我们仿效耶稣《圣经》的表现手法，用近两百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来展现孔子人生中的家世、从学、行教、仕鲁、周游、归鲁诸阶段的发展轨迹，突出孔子做人、做事的修养成就，目的是让读者在这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我们所说的“东方圣经”，与耶稣《圣经》相比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耶稣《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而耶稣

则是基督教的教主，是神或神的化身。因为他是上帝（即天主）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救赎人类的；他虽然降世成人，但死后仍然复活升天；其生是个谜，其死同样是个谜。“东方圣经”则不同。它包括儒家的经典——《论语》，但不局限于《论语》，它是孔子做人、做事的修养和智慧的故事化。它推崇的孔子不是神，而是儒家学派或儒家社会集团的创始人和领袖；孔子是有血有肉的常人，其不同于常人者，智慧高超而已；他的生，清清楚楚，他的死，也明明白白，史之所载，平平实实，无丝毫神秘之处。第二，由于孔子是人不是神，所以，他只说人道，不说神道。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说：“所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这就是说，孔子所说的“道”，是做人的道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仁”，“仁”是孔子人道观的核心。孔子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并未肯定神的存在，而是把神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因此，他只讲现世的生活，不讲天国的生活；只讲“事人”，不讲“事鬼”；只讲“知生”，不讲“知死”；只讲人爱，不讲神爱；只讲智慧的高低，不讲“原罪”的观念；只讲性相近，不讲善与恶；只讲教化的功能，不讲盲目的信仰。与孔子不同，耶稣《圣经》则只讲神道，不讲人道，或者说，它用神道来讲人道，把人道归结为神道。它承认灵魂不灭，从而把人的生活与世界分成两截，一截是此岸世界，即现世的生活，另一截是彼岸世界，即天国生活；现世生活、此岸世界是暂时的，天国生活、彼岸世界是永久的，人们应放弃前者，追求后者。第三，耶稣讲博爱，但在来源上，与孔子的仁爱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所说的仁爱，是从

人类所有的理性与同类意识产生出来的，耶稣所说的博爱，其来源是神，因为他认为，人是生来有罪的动物，只有超人的神是无罪的，人要脱离罪恶的深渊，唯有相信神、依靠神、顺服神，求神的恩典来洗净自身的罪恶。所以，孔子重视的是一个“教”字，即依靠教化的功能来唤醒人类的理性与爱心，而耶稣所重视的则是一个“信”字，即依靠对神的信仰来获得神的爱。

我们如此强调“东方圣经”和耶稣《圣经》的区别，并无抬高前者贬低后者之意，应该说，二者各有其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就从“原罪”问题来说，中国哲学史中，不论是性善说、性恶说，还是性无善无恶说，都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因为“原罪”说包含着一个思想，即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生来就有自由意志、善恶均可由人自由选择，而中国哲学则缺乏这样一种传统。中国哲学有一个理性主义的传统，它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这是同孔子的提倡分不开的；但它由此导致宿命论，并形成成为一个传统，则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耶稣《圣经》，重视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由此导致唯意志论，并形成了一个传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我们着力考察“东方圣经”的基本特点，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告诉读者，“东方圣经”与耶稣《圣经》是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系统的文化，内容上有根本性的区别，不可等而视之；二是让读者明确，孔子是我国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他的人格和学说值得尊敬，但要保持高度的理性，决不可走火入魔，将孔子神化，孔子是理性主义者与重知主义者，是人决不是神。这两点，是编写本书的另一个指导原则。遵照这

一原则，我们对流行于世的有关孔子的资料（包括记述、评传、故事），进行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凡是带有迷信和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一概予以摒弃；而对那些说法不一的资料，只要对说明孔子的人格和学说有积极价值的，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因为本书采用的是故事体，不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

“仁”与“智”的统一，是孔子学说的中心，也是他的理想人格（圣人）的主要特征。这是理解“东方圣经”的根本之点。“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孔子心目中，“仁”是君子必备的品德，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时刻不离开“仁”，哪怕是仓促之间，颠沛流离之际，都必定是致力于“仁”。他称颜渊好学，就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核心地位。

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仁为“爱人”（均见《论语·颜渊》）。而且提出：“忠恕”是实行“仁”的根本途径。《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里仁》又说：“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说的“仁之方”，就是用推己及人的方式实行“仁”。而要“推己及人”，实际上是以两个原则为前提：一是人道（仁爱）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即肯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的理性都能判断是非、善恶，所以“能近取譬”。讨论“三年之丧”，宰我以为居丧三年太久，周年就可以了，并认为居丧期

间，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食稻谷，着锦衣。孔子对他提出了批评，指出：君子对于父母的爱和怀念，都自愿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都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而宰我却作相反的回答，这是“不仁”的表现，因为他违背了情理。总之，孔子的“仁”，是情（爱心、同情心）和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是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

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还体现在“知”的概念上。樊迟问“知”，孔子回答“知人”。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可见孔子的“知”，主要是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认为有了这种认识，就利于实行“仁”，所以“知”是从属于“仁”的。不过，转过来说，没有“知（智）”，也就没有真正的“仁”。孔子称道令尹子文“忠”，称道陈文子“清”，却不称许他们为“仁”，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就是说，“知”是“仁”的必要条件，对伦理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自觉的仁德。所以，“仁”与“智”是统一的。“仁”与“智”的统一，也就是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所以孔子的认识论的命题都具有伦理学意义。从认识的内容来说，“知”主要是“知人”；“学”主要是“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思”主要是“言思忠，事思敬，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等等。认识过程其实也就是德性培养过程：“知”代替“不知”，克服“意、必、固、我”，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人的美德被培养起来。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目标就是要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他自己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品德为学生树立了榜样。“学而不厌”是“知（智）”，“诲人不倦”是“仁”，仁智

统一则为“圣人”。后来，儒家学派都用“仁且智”来称道孔子的人格。孟子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解蔽》）

仁智统一，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道观的最本质的东西，因而它也就成为指导撰写本书的一个根本原则。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本书的写作方法。本书把孔子的人生分成家世、从学、行教、仕鲁、周游、归鲁诸阶段，勾画其思想发生、发展、成熟的演进过程，这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本书将孔子的仁德、礼教、中庸等人生哲理，蕴含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中，这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本书中用大量的故事讲“仁”与“礼”，并对“六艺”的具体知识和古代的文化作了介绍，这是德育和智育的结合；本书既重视孔子的重知主义，更重视他的智慧学说，力图做到知识与智慧的结合。一本书的特点，往往表现在它的方法论上。如果问本书与当前流行的关于孔子的评传和故事的书有何特点？我们说，这特点就表现在上述的几个“结合”上。

1989年，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议的宣言上宣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个论断，不无道理。孔子仁智统一学说的那个“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知识或理智，二是指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洞见，即智慧，它相当于印度佛学所说的“般若”和“转识成智”的那个“智”。在这二者之中，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后者，即智慧。一天，孔子在给学生们上课，突然

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说罢，便不作声。而曾参则立即回答：“唯”。说一声“是的”，也不再讲什么。这真有点像印度佛教的“拈花微笑”的故事！其实，孔子是说他的学说的根本，是“道”，即贯穿于一切知识中的那个“一”，做学问的最高目的，就在于寻找到那个“一”，而这，仅靠一般的理智是办不到的，把握“道”或“一”，要靠穷通天人的洞见，即智慧。孔子又告诉子贡说，子贡呀，你以为我的学问，是只从多方面的学习而记闻来的吗？不是的！“予一以贯之。”我的学问是得到一个东西，懂了以后，一通百通。这也是讲智慧比知识更为重要，因为获得“一”，知识自身无能为力，通常的理智也是办不到的，能把握“一”的，唯有洞见，唯有智慧。《论语·子罕》中有一段话：“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孔子的真正的修养。孔子以为，知识的最高处就是“无知”，就是超越用通常名言所表达的知识，而达到学问的最高境界——“道”或“一”，即智慧所要把握的境界。在孔子看来，智慧，有些是名言可以表达的，有些则是名言所不能表达的，如“两端”，即矛盾双方，穷究到底，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通常的名言不可表达的。可见，孔子最重视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有人根据这段话，说孔子只重视知识，不重视智慧，这是不正确的。其实，《论语》一书所讲的，许多都是和“天道”与“性命”有关的问题。性与天道的问题，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它是“超言绝象”的，是不可言说的，说了别人也不懂，所以子贡才说了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不可得而闻”，是闻者的水平问题，不能据此说孔子不重

视智慧。

孔子的智慧学说，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智慧的具体性，即他所谓的智慧，体现了天与人、内与外、性与天道的统一，是对天与人、内与外、性与天道之间关系的全面的把握。最能说明这个特点的，是孔子的如下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对他一生修养过程和成圣路径的总结。他说他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人生的学问而言，即就人道观来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到了五十岁，对天命也就是天道有所认识，即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作为认识的对象，但这时，天与人、主观与客观（内与外）仍然是对立的。就是说，直到五十岁，孔子的学问还处在知识的积累阶段，尚未开始向智慧的飞跃。到了六十岁，孔子的学问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他所说的“六十而耳顺”。学术界对“六十而耳顺”这句话向来解释不一，我们采用朱熹的解释，他说：“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四书集注》）“声入心通，无所违逆”，是说客观和主观（外与内）、天与人是彼此会通、不相对立的；“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是说“知”达到了顶点、达到于“不思而得”即理性直觉的境界，也就是知识实现了向智慧的飞跃。依据朱熹的解释，孔子六十岁时已开始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孔子达到了与天道的完全合一，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即完

全自由的境界。上面那段话，还告诉我们，孔子的修养过程，是人的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精神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表现了性与天道的合一，也表现了孔子对性与天道的全面的把握，一句话，表现了孔子智慧学说的根本特点——智慧的具体性。

孔子智慧学说的具体性的特点，被历代儒者所发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将它推进到了最高峰。王夫之借助人的感性活动，对天人交互作用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证。他说：“色声味之授我以道，我之受之也以性。”即客观事物的色声等感性性质给予我以“道”（客观规律与当然之则），我接受了道，而使性“日生日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吾授色声味也以性，色声味之受之也各以其道。”（《尚书引义·顾命》）即我通过感性活动而使性得以显现，我的本质从而对象化、形象化了，而对对象之接受我的作用，则是“各以其道”（按对象固有的规律）。这个思想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在性与天道关系上的最高成就。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呼吁在 21 世纪人类要回到孔子那里去吸取他的智慧，如果是指孔子把天与人、内与外、性与天道看成是统一的，并对其作全面把握的具体性的智慧，特别是指王夫之所说的把握天人交互作用的那种智慧，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与西方哲学和宗教相比，这种智慧确有它的优越性。古希腊哲学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大体上把世界二分为超越性的本体与现实世界，其后，基督教更把世界分裂为二，并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绝然对立起来，这无疑是一个缺陷。当然，孔子的智慧，即使是王夫之的天人交互作用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比较朴素，缺乏形式逻辑的严密性，容易流于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导致乡愿的处世哲学。因

此，孔子的智慧，中国传统的智慧，要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实证论的合理因素，站在时代的高度使其进一步现代化，即使其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只有这样，孔子的智慧，中国传统的智慧，才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哲学智慧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愿它对世界的读者，能起到智慧上的启迪作用。

在即将结束本序言的时候，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本书是根据《论语》、《左传》、《孔子世家》、《史记》、《孟子》等史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史实不便作过多的夸张与虚构，因而在情节的生动性方面，不能不受到限制；书中出现大量的对话，就是这一局限的表现。第二，本书既不是孔子的传记，又不是《论语》的注释，而是对孔子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主要事迹和基本思想的故事化，它的每则故事，都是经过作者对史籍资料进行剪裁、选择和加工之后写出来的，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视它了解孔子的辅助读物，则可，而用它来对孔子进行全面评价，则不可。第三，用故事的形式来讲孔子，也要涉及一些观点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尽量不发表议论、少作分析的做法；有些问题，留给读者去分析、去思考、去理解、去体会。当然，在材料的取舍上，作者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孔子虽然是中国的圣人、东方的圣人，乃至是世界的圣人，但他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圣人”也是人，所不同的，只是他比常人有更高的智慧而已。孔子既是人，特别是两千五百年以前的人，他就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其言行、学说，就不能不具有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二重性。提升和弘扬其正面的价值，去掉和限制其负面的价值，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对孔子所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

哲人虽逝，但智慧长存！为了让孔子的智慧在全人类的心中闪耀，我们愿将这本《东方圣经的故事》，奉献给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

臧宏 朱仁夫 何钦法
于 1997. 6

目 录

序.....	(1)
--------	-----

出世篇

孔仲尼生平简介.....	(3)
远祖微子逃离纣王.....	(7)
微子创立宋国	(10)
十世祖弗父何铸鼎减后代	(12)
六世祖孔父嘉——孔姓第一人	(14)
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徵在	(16)
三岁丧父随母迁家曲阜	(21)
六岁学做祭祀游戏	(25)
开蒙识字聪明过人	(27)
自幼富有仁慈善心	(30)
问母解惑 立志为师	(32)
敢与老师争辩是非	(34)
帮助残疾哥哥开商店	(36)
为求学问 拜师外公	(38)
向外公学习做人的道理	(40)
私下去做叔孙家的牧童	(42)

到季孙家当一名乘田	(45)
边当乘田边学乐、射、御	(47)
入太庙 每事问	(49)
合葬父母于防山	(51)
和南宫适、孟懿子谈“礼”	(53)
委吏任上显露才干	(56)
宴会门前遭阳虎凌辱	(58)
娶宋国亓官氏之女为妻	(60)
借昭公之礼为儿命名	(62)
兼任鲁国的司职吏	(64)
向郈子请教古代官制	(66)
向老子学习周朝古礼	(69)
向苾弘求教《韶》乐、《武》乐	(75)
临别前的老子赠言	(77)
学习师襄子 超过师襄子	(79)

行教篇

立志行教	(83)
有教无类	(85)
冉耕入学	(88)
初教子路	(90)
和弟子谈做人做学问	(93)
讲“三戒”、“九思”、“三乐”	(95)
子路、伯牛问好学	(98)
与南宫子容谈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100)
教子于庙堂	(103)